

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。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,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、起好步,需要深入调研、统筹谋划。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,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,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。近期,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《江村经济》一书的村——江村(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)开展调研,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。

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

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赋



开弦弓村是公共文化服务示范村,村内建有江村文化弄堂。弄堂两侧,一幢幢独立民居宽敞美丽。 （资料图片）

村落布局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关系等全貌。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,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,分析经济制度、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,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。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,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,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。

在江村,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,召开了座谈会,走街串巷访谈农户。今天的江村,与《江村经济》所描绘的情景相比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人们生活小康,家家住上楼房,通上自来水、装上抽水马桶、使上热水器、用上液化气,宽带、数字电视全覆盖,村道全部水泥硬化,90%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,村里充满生机活力,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。可以说,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,保留着一些传统,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。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,变是绝对的,不变是相对的,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。

第一,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,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。80年前,江村80%农户养蚕,主要是男耕女织,男的种植稻桑,女的养蚕缫丝。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,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,办起了生丝厂。新中国成立后,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,成为社办企业。改革开放后,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,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。进入新世纪,村里个体、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,基本形成了以丝织、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,全村70%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。2017年,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,村集体收入265万元。江村男耕女织、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,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,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。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、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,产业优化升级,链条纵向延伸,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。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,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,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,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,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、“夫妻店”,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。目前,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,有的代工,有的自产自销。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,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,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,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。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。

第二,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,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。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,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、田面两层,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地主占有,90%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。1951年,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。人民公社时期,土地集体所有、集体经营。改革开放后,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。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,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,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,无论是费老描述的“地是活的家产,钱是会用光的,可地是用不完的”,还是现在在村民认为的“家里可以没门,手里不能没田”,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。也正因此,80年来,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。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,清代同治、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,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,面积精确到分厘。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上,面积精确到厘毫。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,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,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分置。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(所有权)、田面(经营权)两权分离相比,现在的“三权”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,提高了效率,更防止了土地兼并,保障了公平。村民陈月生说,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,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。座谈会上,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,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,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,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。

第三,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,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“差序格局”。1935年,江村有359户1458人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and 人们生活水平起伏,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自然增长转变。目前,江村有420户1680人(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),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%和15.2%;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.4%,增长了近26个

百分点。80年前,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,主要从事理发、银匠等特殊职业;现在,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,最高曾达1000多人。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,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,维持着以亲缘、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,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、血缘关系的扩展,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。我在村民周小芳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,她的外婆、母亲、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,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,在江村很普遍。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,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,吃茶话事、交流见闻,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。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,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,仍不能落户江村,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,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。

第四,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,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。80年前,费老描述下的江村,人畜混住,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,生活没有保障,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。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,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,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,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。可以说,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,但婚姻、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。两头挂花幡、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。由于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,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。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,招女婿190人。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,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,来回走动。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,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,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,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。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,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,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。也正因此,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,1935年江村户均4人,2016年户均3.98人,都是小规模家庭。

第五,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,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。早在1929年,江村实行地方自治,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。1935年,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。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,建立行政村。人民公社时期,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。改革开放后,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,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。80年来,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,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88岁的周梅生讲,邻里有矛盾纠纷,解放前靠宗族势力,现在是找村委会,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,才走司法渠道。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,涉及承包地调整、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,村民都会集体讨论、民主决策,很少有纠纷和矛盾。江村的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教师等有威望的群体,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、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,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。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,在村里很有威信,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。在江村,尊老爱幼、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,传统礼治、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,为健全和完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三、全面看待农村,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规律

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,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,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,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

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,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。从江村可以看到,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,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、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。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,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,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,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。

一要坚持循序渐进,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。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,随处可见外观现代、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,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,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,他们住惯了老房子,不愿意搬到新房。传统与现代、变化与不变,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。这种

变与不变的选择,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,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。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,二轮承包以来,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,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,可谓一组合一策。有的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,一直没有调整土地;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,动账不动地;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。从江村的土地、人口、婚姻、家庭等制度看,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、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,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、自然的,而不是断代的、割裂的。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,要尊重实际,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、循序渐进,既要着眼长远目标、不违背发展方向,又要立足当前实际、不违背发展规律。要克服求大求快、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思想,处理好快与慢、量与质、点与面的关系,既把握方向,又把握节奏,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、系统性风险,牢牢乡村发展的根基。

二要坚持城乡融合,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。在江村,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。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,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,实现了无害化处理。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,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,生活垃圾分类处理,看电影、跳广场舞、打篮球、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。走在村里,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。与此同时,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、文化习俗,这是江村的“根”,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。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,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,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,被人们称为“农民教授”。在江村可以感受到,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,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、时尚的生活方式、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,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、独有的生活习俗、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。因此,才有农村人进城、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,城乡融合开始加快,城乡关系正在重塑,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。推进乡村振兴,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,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、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,也要尊重乡村文化、传承农耕文明,通过以城带乡、功能互补、有机衔接,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、协同发展,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、互促互进。

三要坚持尊重农民,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。在江村座谈时,大家纷纷表示,村庄环境改善了,居住条件变好了,看病养老有保障了,挣钱渠道更多了,幸福指数更高了。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,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,看病能报销一半,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。谈到乡村振兴时,大家劲头十足,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。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,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。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,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,共同闯市场。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。要想农民所想、急农民所急,凡是农民急需的、期盼的、憧憬的,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。农民是乡村的主人,乡村是农民的家园。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,尊重农民主体地位,不能代替农民、替农民决策,更不能排斥农民。

四要坚持统筹规划,一张蓝图干到底。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,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、楼房、别墅等五代变迁。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,当时是因为贫穷;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,房子却换了四代。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,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;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,造成了巨大浪费。农房建设无序,没有统一规划和标准,以至于拆了建、建了拆,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。市里的同志讲,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、没有部门管理、没有总体规划、没有房型设计、没有建设标准、没有质量验收,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。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,波兰是土地私有制,当地农民建房,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、装修等,但建在哪儿、面积、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。乡村振兴、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,谋定而后动,想好了再干,防止折腾、防止浪费、防止走弯路,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,一年接着一年干,久久为功,必成美画。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、个性和特点,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,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,建设美丽宜居乡村,而不是缩小版城市,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。

五要坚持人才首要,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。江村巨变的根本,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、市场意识强、能吃苦耐劳拼搏的人才。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,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,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。这次到江村,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。“70后”沈斌先后在镇农办、烂烂村工作过,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,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。“80后”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,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,为村民搞好服务。“90后”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,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,成为新生代偶像。由于生活条件好、发展机会多,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。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。这表明,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。要始终把人才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,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,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,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。目前,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,要加大培训力度,充分挖掘培养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、经理人等农村能人,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。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,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,吸引农民工、大学生、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、退休人员等回流,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。



体育文化下基层活动在村民文化广场举行。图为木兰拳表演展示。 （资料图片）



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,村舍依水而建、云绕水依。图为《江村经济》一书中的小清河。 （资料图片）

第三,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,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。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、智能手机的普及,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,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,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、革命性的。过去通讯不发达,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;改革开放以后,收音机、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;新世纪以来,手机、电脑、网络向农村覆盖。据统计,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。现在,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,随时随地微信交流、视频对话。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,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。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。

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,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。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,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,把握发展机遇,激发发展活力,引导加快变迁,促进农业全面升级、农村全面进步、农民全面发展,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。在这个历史进程中,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、光荣的历史使命,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、时刻关注这个变局、全面把握这个变局,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,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,顺应历史发展方向。

二、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

今天的江村,与《江村经济》所描绘的情景相比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,变是绝对的,不变是相对的,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

江村本名开弦弓村,紧邻太湖,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,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,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、鱼米之乡。1936年,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,写出了著名的《江村经济》,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,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。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,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,涉及消费、生产、分配、贸易、土地、生活、婚姻、习俗等方方面面,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